

DOI: 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01

主持人语(宋学勤):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如何书写好百年大党的百年历史,如何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进一步开拓研究新领域,是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命题。但无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还是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相比,学界对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还显得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期我们专门组织了6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文,研究探讨中共党史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得与失。陈金龙教授《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从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空间拓展、方法创新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欧阳军喜教授《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文,从问题意识与话语体系两个方面谈了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宋学勤教授《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指出,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林绪武教授《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指出,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周良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指出,百年党史研究范式的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王广义教授《时间·空间·学科: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视域》指出,要从长时段、全景式、跨学科等视域来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这6篇论文都是作者将自己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经验心得进行科学抽象撰写而成,以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

收稿日期:2020-12-01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当代中国社会史;林绪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王广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研究”(2019MZD021)的阶段性成果。

化史的维度。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回顾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从文化维度书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是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从三种文化形态切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三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关联,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首先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传统文化在强调继承的同时,侧重于批判;改革时期,对传统文化在强调批判的同时,侧重于继承。回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知演进的历史进程,辨析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呈现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历史情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仍需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这种态度应如何评价,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确立取舍、选择的标准,否则难以操作和实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封建性”与“民主性”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政治标准,仅用这一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需要厘定和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回答和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是总体性判断,中国共产党究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有待具体史实的呈现和支撑。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是什么,文化特征、文化功能是什么,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革命精神无疑是革命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谱系,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凝聚,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需要研究的内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同一过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如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功能,有待史实建构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实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观念变迁的作用,都需要史实建构和厘清。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空间拓展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具有多维面相,经典阅读史、纪念活动史、记忆建构史、文化符号史、形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建构史、政党文化史，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有待拓展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受，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阅读经典、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文本的阅读，是党史的面相之一。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推荐阅读书目，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经典化。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向中央研究组以及各高级研究组推荐1939年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一书。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议读四本经典著作。他说“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①1949年3月，经毛泽东审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干部学习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经典阅读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全过程，同一经典文本，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阅读的重点、阅读的方式、提取的理论资源也不一样。从阅读动因、阅读主体、阅读方法、阅读效果等方面展开经典阅读史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新对象。与经典阅读密切相关的经典文本的翻译、出版、发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既有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也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既有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有建党纪念、建军纪念、红军长征纪念、国庆纪念、抗美援朝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既有孙中山、鲁迅纪念，也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纪念和革命英烈纪念。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活动，既要建构纪念空间，也要借助纪念符号，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纪念活动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对于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强化，对于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建构，对于社会动员和各方面力量凝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演进过程，呈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具体史实，诠释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功能，有利于拓宽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关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立、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记忆的建构，留下了大量报刊史料、回忆录、口述史料。从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建构方式、历史记忆建构内容、历史记忆建构功能等方面展开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有待拓展的空间。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历史记忆的建构，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呈现了中共一大的部分史实，还原了历史的一些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和总结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借助七一建党纪念回顾历史进程、评价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通过核心概念、重大历史事件、伟大历史贡献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种话语方式。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过程，概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方式，辨析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呈现的史实，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内涵的展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存的标语口号、宣传画、图像、年历、货币、邮票，都属于文化符号。为进行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了系列标语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代烙印，蕴含丰富的历史内容，应纳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图像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围绕领袖图像的刊载或悬挂，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具体规定。如1950年9月8日，《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提出：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群众游行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可加乌兰夫像，在新疆可加鲍尔汉、赛福鼎像。为了教育群众了解中国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各大城市应增加各国人民领袖的像。各报纸首页应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①1951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若干事项的补充通知，对集会挂像、群众游行抬像做出明确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这一点较1950年国庆没有变化。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为：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②从文化维度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细节与内涵。

中国共产党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实践，既是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内涵进行了准确定位，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比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际地位塑造国家形象；通过对外交往、国际援助、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通过执政宗旨的彰显、执政能力的提升、历史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塑造政党形象；通过领袖人物历史功绩、精神品格、道德风范的诠释塑造政党形象。梳理中国共产党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塑造的历史过程、基本内涵、主要方法，有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党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识。比如，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历史意义、当代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广义的文化包含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和修正，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保障制度、自身建设制度，这些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容，其史实也有待建构和厘清。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创新

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引入多维分析框架、理论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充分运用和借鉴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生成、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文化学的视域，应引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如此，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播的旨趣、方法、载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构实践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整合，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这些问题自然呈现出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既可运用文献研究，也可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整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历史档案，可以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文化方针、文化实践演进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概貌；通过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遗址、遗物，留存于各种建筑、石刻上的标语口号、图像或其他文化符号，也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应综合考察和审视。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文献选编 1949—1956》第3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7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文献选编 1949—1956》第3册，第294页。

化) 是—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折射和反映, 不能孤立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 而应紧密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 将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置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分析, 只有如此, 才能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总之, 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 有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内涵, 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 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有利于以史育人, 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育人功能。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欧阳军喜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几乎—样长久。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党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新近有学者提出“新革命史”的主张, 尝试把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等引入党史研究中, 以区别于传统的党史、革命史研究。^② 这些探索对于补正过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 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 除了在方法论层面大胆创新外, 还需对传统史观影响下形成的党史学术体系加以改造。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问题意识的转换, 二是话语体系的创新。

一、立足当代中国, 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

—时代有—时代的学术。过往的中共党史研究, 脱胎于革命年代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取得突破, 首先要立足当代中国, 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

从 1920 年代起, 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几经转换。1926 年, 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 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 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 这个报告可以说是 1920 年代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党史文本。蔡和森的这个报告, 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 这就是“我党现在已到了—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个—个程度呢? 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③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转换。1930 年初, 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党内作了《党史报告》,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年来的历史。李立三认为“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 因此必须对党史“有明确的认识”。—党史文本的问题意识开始转向党的斗争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④ 这样的问题意识—直延续到了 1940 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期间, 中共党史被认为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乔木曾经认为, “我们党二十—年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 663—664 页。

② 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1 期; 李金铮: 《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 2016 年第 11 期; 刘永华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 《开放时代》, 2015 年第 2 期。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2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第 204 页。

的历史，就是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① 刘少奇也曾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② 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共党史的历史编纂。1950年3月，由胡华主持编写的华北大学“中共党史”课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正式出版。该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怎样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③ 1951年6月，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④ 该书基本沿袭了整风运动期间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从而正式确立了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正统史观。^⑤ 这种正统史观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产生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之中，服从于服务于当时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指导当时的革命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具有积极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党史研究应该有新的问题意识。换言之，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随着问题意识的转换，党史研究的视野也会变化，论题、论域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没有问题的地方会出现问题，原来不是问题的也可能会成为问题，而原来一些非常重要的论题则有可能退居其次，这是新时代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前提。

所谓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党史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实践，立足于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其问题意识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新时代的党史研究，问题意识应来自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⑥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如果说过往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正确性，那么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转换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二，所谓党史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也就是不能立足于外国和西方。中国大陆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曾一度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很大。后来一些学者在纠正这一偏向的同时转而追随西方。其实这两种偏向都是有问题的，套用联共党史的框架来书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抹杀了中共党史的独特性；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同样无法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西方的中共党史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和国、共两党斗争及其结果的影响，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绝不能盲目追随西方。中共党史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问题意识应该是中国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中国的。无论我们的党史研究如何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丧失“中国”这个大的视野。只有立足中国，从“中国问题”出发，这样的党史研究才是中国的，为中国所需要的。

① 胡乔木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② 刘少奇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页。

③ 胡华 《前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

④ 刘少奇对该文的修改共有2次，总计修改480余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⑤ 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毛泽东”一词共出现118次，正文中提及的毛泽东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⑥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二、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构建新的党史话语体系

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取得突破，还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弄清楚现有的党史话语的源流，突破革命年代形成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党史研究的影响，构建新的党史话语体系。

“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当作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准确的。问题在于，过往的研究在以革命为中心建构党史话语体系的时候，过分凸显了领袖人物与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面相，导致党史书写有领袖无民众，有政治斗争无社会建设，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党的历史。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自觉和反思。1985年胡乔木在谈及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时，曾表示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而且由于只写大人物不写小人物，该书显得“枯燥无味”。^① 龚育之先生也认为，“研究党史不能仅限于政治斗争”，“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② 新近又有学者指出，党史著作应该包括党领导人民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党史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纵向的党的历史全过程，也包括横向的党领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活动。^③ 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基于这种认识，新时期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大人物之外”及“政治斗争之外”的研究逐渐兴起，党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大为拓展。不过，尽管研究者的眼光从政治转向社会，从上层转向下层，但这基本上仍然只是在“革命之内”的延伸，并未真正跳出那种以“革命”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中共党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还需要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

所谓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有两个含义。一是把“革命之外”纳入党史研究范畴；二是讲清楚“革命”与“革命之外”的关联与互动。实际上，任何一场革命，均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例外，它本身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的历史运动，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国家的构建和新社会的塑造。固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主流，但绝不能以革命史取代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是两个范畴。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变成单纯的革命史。因此，除了“革命”，“革命之外”也应得到同等的重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从单纯的关注“革命”向既关注“革命”也关注“革命之外”转变，必须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面貌。正如胡绳所说，在革命之外还有一种历史，写革命历史的同时如果不写出其他的历史，也很难写得准确。^④

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必须加强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提出了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其基本的含义，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把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就叫作“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⑤ 毛泽东所讲的“古今中外法”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根据党内学习、研究党史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话语，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并未过时，仍然是我们研究

①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7页。

② 龚育之《党史札记一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2页。

③ 欧阳淞《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转引自《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233页。

⑤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6页。

党史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党史研究实践中，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中国”和“己方”，却忽视了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结果原本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历史变成了简单的、单向度的历史。

所谓加强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是指研究者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要研究同时代的“外国”和“彼方”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仅要使用中国共产党一方的材料，也要使用“外国”和“彼方”的相关材料。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人民解放的历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外国”和“彼方”。不研究它们，就无法解释革命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此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①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也是必须研究的另一种“彼方”。如果不研究资产阶级，就无法真正弄清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根源。又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②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就必须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外国”因素都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之，离开了“外国”和“彼方”，我们就无法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法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如何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对“革命之外”的研究，并不是要改变中共党史的研究属性，扩张中共党史研究的边界。中共党史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以共产党的活动与思想为中心，“革命之外”只是作为“他者”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共党史。如果以“革命之外”为中心，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正如胡绳所说，党的历史，“主角是党、党员、党的干部。就像写反‘围剿’时，必须要写国民党是怎么‘围剿’的，但主要是写被‘围剿’的红军是怎么抵抗的。”^③总之，我们强调要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是为了在“革命”与“革命之外”的互动中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变得更加客观准确。一旦我们在研究中把视野同时投向“革命”和“革命之外”，我们的眼界将会进一步打开，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图景也会变得更加具体与生动。

①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②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7页。

③ 金冲及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3页。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

宋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哪里开始, 研究其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样, 已达百年。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创造了辉煌成就,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领域中, 都积累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史资源,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 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这对从思想史角度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规律, 是一个重大缺陷。为此, 加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亟需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一、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所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 学者们进行了通史与专史的研究, 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②和张静如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③等; 还有专史的著作出版, 诸如顾龙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④、范小方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⑤、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⑥等。但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与弱项。一是,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 但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等, 都缺乏应有的讨论, 更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这种研究状况, 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是, 就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来说, 目前学界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 鲜有从社会思想角度开展研究。目前仅有的有关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社会学界, 且大多遵循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 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 大多关注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及文集等, 较为注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经典文献资料的发掘, 而缺乏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缺乏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思想的生成流变及其因果联系的研究。学界长期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大议题研究的缺失, 使得中共党史学科在更为全面、细致地阐释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上存在着部分“失声”“失语”的现象。

*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70年执政实践与经验”(19GJJB00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高校示范马院和团队建设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19JDSZK036)的阶段性成果。

- ② 张静如主编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 ③ 张静如总主编 《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 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
- ④ 顾龙生主编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 ⑤ 范小方主编 《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 ⑥ 郑师渠主编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其社会思想就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与丰富的内涵,不仅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不断发展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同向同行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丰富、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建设实践,创造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建设,尤其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指引的一整套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探索和实践是成功的。这一整套社会思想的生成、发展、流变及其接续联系,既蕴含着深深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印记,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凝聚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所累积的丰富思想资源。这种多渊源所凝练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这一基本特质,是贯穿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一切真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等处于平等地位的思想史专史序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谱系的重要一体。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所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

二、探寻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百年演进的动力与样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肩负历史使命,擘画目标蓝图。“砸烂旧社会”与“建设新社会”的美好愿景,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的发轫动力,是其早期社会思想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思想的萌生,究其动力,始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下层民众朴素的生存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反思,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理想的追求,这既是“社会革命”的缘起,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逐步发展并形成清晰纲领的重要阶段。在以后的社会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社会思想逐步得到民众认可,成为发动民众参加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成功的根基。

何为“新社会”?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新社会”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便是“自由”“平等”“公正”,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社会的目标设计,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继承和延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社会”建设目标的核心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民众生活状况的感知与体认,出于一种本真的与人性化同情,使他们“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①从而萌生“新社会”的社会理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下,开始将其社会理想实现由“理想”向现实的转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也即是在此意义上实现的重要转折。正是这一次思想认识与理念的转折,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动力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启蒙,进一步使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从“新社会”跃升到“新国家”的层面找到了清晰的实现路径,即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为了“社会理想的实现”,他们开始建党,进而革命,其间,其“社会思想”不断因应时势,配合其革命实践,不断具象化,不断提升“革命化”的质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化”表征,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时”与“势”而进行的策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政权建设与恢复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分属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之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受到政治化与集体化思维影响,这一特色极为鲜明,其核心要义为“办社会”。特别是在实行“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社会变迁成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即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结果都是在“计划”之列。今天,从思想史的转型来看,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体现出经验探索的阶段特征,以有别于域外国家社会思想的独创性,发挥了中国这一时期社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会思想的特有贡献。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也缺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生动力，限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所以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搞活”，以及“收缩与调适”。

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松绑”。“松”传统的高度集中体制之“绑”，“松”传统的各种僵化观念之“绑”。如同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控制手段——宣传、强制和组织——全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收缩和弱化，尽管它们仍然是有效的控制手段。全球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位交往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①例如，中国共产党劳动就业思想从原来的“包下来”模式即政府通过办企业来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到“三结合”“就业社会化”模式即由劳动者自己寻找就业机会、自我创业、自我就业。这就引发了劳动力和人口社会化流动，而不是由政府统管起来。针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非同步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随着实践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调整社会思想，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补齐社会建设的短板，调动各种力量，探索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法路径，社会建设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不断跃升。进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呈现了有别于新中国前30年的新样态。从实践上看，这也是由于经历了一定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总结历史经验，对民众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其社会思想“社会化”的深刻变化。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充分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方法论的创新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经历了从“革命化”至“政治化”再到“社会化”的飞跃，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不断探索。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谈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②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价值旨向的下移，更加注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从文本上讲，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五年计划的名称由“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使得前五个“五年计划”中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状态的社会发展和建设，开始不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存在，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五年计划”这一国家规划战略上对于“社会”认识的转变，即“社会”不再属于经济的一个方面，而成为与经济并列的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后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表达出这样的“人本关怀”。江泽民曾提出：“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抛弃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真正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新的进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③在此思想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众生活问题进行了许多战略性的、本质性的探索和思考，如“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就业乃民生之本”的思想等。胡锦涛也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民生是社会和谐之本”等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当选总书记的第一天就承诺：“我们的人民

① [美]沈大伟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俞可平审定《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提出了“美好生活”的理念。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②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治国理政,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也围绕民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性探索和创造性反思, 社会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 推动了中国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社会思想“社会化”, 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定位。所谓社会思想“社会化”, 是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府控制性的社会转向政府进行宏观社会管理而微观自主活动的社会。这是为适应改革开放后国情和社情民意的不断变化而做出的重大改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回归“社会”本位, 着眼于民众的需求, 将治理实践细化到社区、民众的生存经验和现实生活状态中去, 并产生较为普遍的“精准”思想, 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理念渗透落实到每一位普通民众的具体实践和发展中去。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思想史, 从对最原初的民众生存权的关注开始, 进而通过革命的路径寻求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 从而去彻底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大以后,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提出, 正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这种以高度重视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依归的社会思想, 所恪守的正是建党之初的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 反映了今昔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思想接续发展而又不断得以完善和升华的境界, 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一致性和逻辑的统一性。从建党之初至今,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不断发展, 有其内在动因, 是民众生活发展的内在需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初心相互交织的结果。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 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始终, 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征。因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 都有其面临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问题, 这是形塑其社会思想的根基, 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社会思想体系的诞生具有决定意义。也正因为它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也正因为它做到了“对症下药”, 所以,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切合中国实际而行之有效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起点和重心, 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 必须把握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塑互构这一总体性特征和前提, 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 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审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因缘流变。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

林绪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 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产物, 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思潮、发表

^①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第70页。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19页。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政见、引领社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无论是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革命派都相继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主张、表达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创办了具有党报党刊属性的刊物，如《新青年》《共产党》等，《向导》则是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众多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应运而生，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同时创办的还有不少地方党报党刊及军队报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先后和《红旗》《求是》构成中共中央的一报一刊。可以说，党报党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报党刊见证了中国革命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中国革命的指向标，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是时代脉搏的感受器。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加强党报党刊史研究，既能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的回顾展现生动画面，又能为新时代发挥党报党刊的媒介作用提供历史借鉴。这里主要围绕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现状谈三点粗浅认识，以供学界讨论和批评。

一、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成果渐多但质量参差不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研究，党报党刊则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学术界对于党报党刊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术成果逐渐增加，无论是著作或是论文，抑或学位论文，都已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甚至关于党报党刊研究各类课题也有一些，这同党报党刊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影响越来越相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执政、由部分执政到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的变迁过程，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长、发展的奋斗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由开始到全面深化的巨大变化，见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因而，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既要研究党报党刊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变迁历程，以及报人群体、报刊思想、报刊发行管理等，即党报党刊的历史，更要研究历史的党报党刊，即借助党报党刊所提供的大量的丰富的资料，深化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及其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因而，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恰逢其时、正当其需，不仅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必要。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固然可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缺少高水平 and 标志性的学术佳作。一方面，这是因为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不够、研究时间不长，尚需学界关注的积累和学者研究的积淀；另一方面，这同党报党刊的资料整理不足、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方法论尚未形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尚未建构等各种因素相关。因而，首先，要全面梳理和整理丰富的党报党刊资料，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大量的党报党刊，因创刊和保存时间久远，既要考虑对这些党报党刊全部影印出版，也要谋划电子化数字化的处理，以及建立相应的党报党刊数据库，更好地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较为全面而基础的资料。其次，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资料，除了党报党刊文本之外，既需要结合中共中央文献和党报党刊编辑及主要撰稿人的档案、文章、日记、回忆录、传记等“他者”文献材料，也要参照国民党方面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材料相互参证进行学术研究，这样，基于资料的丰富、多元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更能无限趋近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更能提升学术成果的深度和厚度。再次，党报党刊的主编、编委会、主要撰稿人等是研究党报党刊史的鲜活材料，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文字之外的关于党报党刊背后的故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编撰群体大多已不在人世，这就需要通过走访其家人及后人，搜集有关个人档案，进行口述采访；对于目前健在的有关编撰群体，更要组织力量进行访谈，抢救口述材料，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学术研究提供多样化的珍贵资料。

同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方法论或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同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或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有相近之处，但更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不能简单地沿袭报刊史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论或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但又必须借助于这些研究的方法论，从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探索和实践建立起自身的方法论，这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成果提高学术质量必须解决的重要学术话题。

二、党报党刊史的个案研究较多但整体研究失衡

从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有些党报党刊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多，如《新青年》《红色中华》等，成果的数量相当多，研究的内容较广泛，这是党报党刊史研究好的积极的方面。当然这种个案研究是越多越好，可以更加充实和扩大党报党刊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然而，与某些党报党刊研究成果较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部分党报党刊鲜有研究者问津，存在着党报与党报、党报与党刊、党刊与党刊研究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较多，新中国后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民主革命时期国内政局相对稳定时段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丰硕，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创办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不足；同一时段的党报研究成果相对厚实，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薄弱；中央层级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密集，地方层级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除了个案研究的不均衡以外，其整体性研究也有失衡的不足。当前，学术界对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考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新闻通史的成果对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考察，将党报党刊史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对党报党刊史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多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但并没有单独地开展系统性研究。^① 另一类是以党报党刊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考察，对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党报党刊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或爬梳，但同样缺少深入研究。^② 以整体的、全面的、大历史视角，从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进行关注，克服既有研究的片面化倾向，借助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揭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复杂面相，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加强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研究，既要克服既有研究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党报与党报、党报与党刊、党刊与党刊研究的不均衡性，也要克服将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具体内容和管理发行体制、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割裂开来的不足，总而言之，既要关注作为“物”的党报党刊的发展，又要关注作为“制”的党报党刊的管理发行体制的演变，还要关注作为“人”的党报党刊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从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弥补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整体研究失衡的不足，实现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整体性和全覆盖。

应当说，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研究著作中，党报党刊的内容一方面占比太少，另一方面缺乏深度，这和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历史地位、重要价值极不相符。因此，整体

^① 梁家禄等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谷长岭等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创刊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一般性介绍；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多有提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9年版)、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润泽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囊括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其中对党报党刊进行了历史考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诞生、发展与壮大，探讨了新中国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但对党报党刊其他大量丰富的内容涉及不多。

^② 方克主编的《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上下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2000年版)，主要聚焦中共中央党刊，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中央党刊的基本概况，介绍了党刊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总结了办刊经验，肯定了党刊作用，但缺少对中央党报的研究。钱承军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列举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前不同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300多种党报党刊，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报刊工作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缺少对新中国后党报党刊的阐述，也缺少对党报党刊中具体内容的深入研究。

梳理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有利于弥补党报党刊整体性研究的不足,构建更加完整的党报党刊史学术研究体系,充分体现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也能够相当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三、党报党刊史的研究视角多元但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来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视角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新闻史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关注了党报党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等;中共党史视角关注了党报党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苏区政权建设、抗战及政治动员、历史纪念及政党、国家形象塑造等发挥的作用;新闻史视角则从报人群体形象、发行管理体制、编撰群体和报刊思想等方面对党报党刊给予关注。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报党刊的重要使命,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载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角使用最多、成果最丰也是应有之义。必须指出,这些多元化视角的研究,丰富了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党报党刊史的多维解读。

尽管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突出表现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本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共党史主要运用的是政治学的方法,新闻史主要运用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方法。举例而言,仅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就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难以借助百年党报党刊揭开历史的复杂面相。事实上,党报党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运用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难以避免其局限性,都无法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因此,要避免单一视角的研究,就需要综合运用档案文献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这既有利于党报党刊史研究取得更加丰富的新的学术成果,并且能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成为党报党刊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又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和学术性、创新性。开展跨学科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趋向,就党报党刊史的跨学科研究而言,一方面,个人的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跨学科的意识 and 行为,可以适当学习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有助于拓展研究视角和提出新观点,另一方面,作为史学研究者,更要主动和其他相近学科多进行交流、沟通和合作,各展所长,合力推进党报党刊史的深化研究。

事实上,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党报党刊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形成和具有中央一报一刊有力配合的发展格局及重要特点,且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党报党刊的主要内容、传播方式和历史使命都不尽相同。因此,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党报党刊进行比较研究,将同一时段、同一地域的党报和党刊进行比较研究,更能凸显出不同党报党刊的特色所在,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发展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失败或挫折的教训,但更有在国内外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艰难求索、完成党的任务的成功经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依然复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和总结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无疑能为复杂环境下党报党刊更好地发展和发挥作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方面,党报党刊只要大胆作为,一定大有可为。而这离不开从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总结经验与启示。所以,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必将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必将能够取得更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原创性成果,从而真正改变党报党刊史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整体研究失衡及研究方法单一的现状。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周良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②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革命史”与“现代化”

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虽然是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但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指导性的线索,才能在充满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洞察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业已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既然如此,那么研究者就应当以此作为历史评判的标准和参照系。

这一研究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史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就明确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③与此同时,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④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限内的一部专史——中共党史,自然也应当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分析和评判党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现代化”范式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的“革命史”叙事结构,从另一个角度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按照这一分析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⑤在党史学界,张静如先生是这一研究范式的首倡者。他提出“从社会现代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这是1956年范文澜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作的一篇学术报告。

④ 转引自张亦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90页。

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① 并强调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②

但这两个范式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们还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一席之地。一些主张“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因此并不一味反对“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③ 而主张“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则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④ 这一“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它有利于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做多角度观察，有利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多方位思考。

因此，从这个思路分析，运用“现代化”研究范式，就可以拓宽党史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弥补“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某些不足。正如胡乔木指出的“革命者在很长时间内是人民中间的少数。柔石写《二月》，鲁迅写《阿Q正传》，写《呐喊》《彷徨》的时代，虽然有共产党，但他们没有写共产党，不能因此说鲁迅就是反革命。”^⑤ 但倘若使用单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就无法对柔石和鲁迅予以合理的分析和评价。

我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对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评价就是一大难题。因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们不仅一直处于校内派系斗争的中心，而且还被迫必须应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每当学运一到，一般教工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但是校长必须直接面对。他们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处境往往十分尴尬。在北京大学，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每个大学校长都能够做到的。然而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我们以革命运动作为批判事件的唯一标准。这既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准确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政策。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一味地革学校的命，把学校都办成“抗大”“陕公”一个样，而只是在承认和利用现行学校制度的前提下，来组织和发展自己的力量。^⑥

二、“单线史”与“复线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采用的都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目的论的叙事方法，它们均根据现时的需要，来诠释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建构各自的历史表述。这种叙事策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拷问。因为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非中心、多样性等观念，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有中心、线性发展等观念完全不同。它接受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认为历史在行进中不断会有“散失”。后来杜赞奇继承并发展福柯的这一历史观，在中国史研究中提出“复线史”的叙事方式。他试图以此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在复线的历史中，客观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⑦ 它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收集线性历史中的已有记录，同时还要善于打捞那些被线性历史压制

① 张静如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② 张静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③ 吴剑杰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488页。

⑤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⑥ 周良书 《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338页。

⑦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或遗弃的过去。也就是说，在历史叙事中，我们“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① 其实，历史主体从来不是历史中单一性的身份认同，我们所表述的研究对象也仅仅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只能算是众多身份认同当中的某一种。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线性历史之外，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恢复其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和重视这一点。胡乔木说“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该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这样，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②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众，对此我们也需要照顾到。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民众都是坚决抵制的，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许多农民不关心时事，认为谁过来都得交税纳粮。他们的认识和活动，当然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因为党的力量达不到。但我们写党史的时候，却应当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其次，在复线的历史中，现在与过去之间存在一种交易(transactional) 关系，现在通过打捞和利用业已散失的意义来重构过去。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意义逐渐散失，而嫁接以相应的新的历史意义。在通常情况下，新意义指示着重心的转换或转喻性地与更早的意义联系起来。它赋予历史主体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并促使未来的历史向着此种叙事结构的内在方向或目标发展。^③ 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就在于发掘历史意义的这种替代或转换的方式，收集那些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或利用的叙事结构。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是受人摈弃的东西，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④ 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⑤ 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⑥ 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致使青年学生引为时尚，出现每以入党为荣这一历史现象。^⑦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但它并非有意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也无法颠覆“单线史”所揭示的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它是要借此使历史摆脱大家所熟知的叙事结构，以展示历史认同的能动性和多样化，以及各种历史表述之间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国史，而是为了确定一个场所，在那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或是在摄取历史之真或是在同

① [法]弗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②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306-307页。

③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25-226页。

④ 《政党论》，《时务报》(第17册)，梁启超1896年12月11日编辑。

⑤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渊源》，《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⑦ 参见周良书《“五四”精英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历史之真挣扎，而历史之真除了通过叙述象征以外是不可得知的”。^①

三、“大历史”与“小历史”

“大历史”，即“大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系统分析或整体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全面陈述与宏观把握。“小历史”，即“小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钩沉拾遗与精审考订。近些年来，后者在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大有超越和取代前者的发展趋势。在研究范式上，它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另一侧面反抗和瓦解现代主义的叙事结构。它主张研究单个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或阶级，所描述的时空范围甚至是几天而不是一个时代或长时段的发展，是一个小群体或小村庄而不是一个政党或国家。

在党史学界，这一研究范式也是方兴未艾。它通过对党史宏观叙事中的某个事件、村庄或学校等诸如此类的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把微观层面作为党史研究的着力点。其主要特征是“目光向下”，由以往偏重上层的政治事件与人物，转向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这样，一方面可以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改变过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方式，以防止大家都挤在某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小历史”也是“大历史”的始基。吕思勉说“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②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小历史”还可借助显微镜式的微观探头，将历史中枝蔓缠绕的复杂情态呈现出来，使之变得“有血有肉”，因而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正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我们从中可以有許多新的发现。^③

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人们过去习惯于处理“宏大叙事”，而忽视对历史细节的深刻分析，这样的确使我们的研究失去了许多鲜活的质感。比如，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我就发现了一些在“大历史”中所见不到的内容。1928年12月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原来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已经关门歇业。“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天之骄子受人殴打，自然怒不可遏，于是向学校提出交涉，要求开除肇事工人，签名者计有一百余人。“我们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发一告全体学生及各界书，内容将此次与学生冲突的经过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细述出来，驳斥学生的无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④这表明校园也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只有将党置于这个特殊“社会”中来观察，才能揭示出党在高校发展的真实状况。

但是，研究“小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写好“大历史”。倘若一味地追随后现代主义，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需“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这样长此以往，“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⑤只要我们检讨当下党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甚至陷入“节日学术”或“纪念史学”的困境，就会发现这种“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当然，要写好“大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众所周知，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曾以书写“大

①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7页。

②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③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Vol. I, trans.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 430.

④ 《十二月份厦门工作报告——政治状况、党的组织、厦大工友的斗争》(1929年1月)，郑文贞、肖学信选编《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1988年编印，第179—180页。

⑤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235页。

历史”闻名于世，但却少有人知他为此付出的心力。在《黄河青山》一书中，黄仁宇说：在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任教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在这门课程中，中国历史仅安排四节课，所以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的全部内容。授课内容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挤满听课者，座椅都没划位。倘若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会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授课人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讲得好，学生报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就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课程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讲课中还不能遗漏重点，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也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以便让一个个独立的故事形成整体，描述要求既翔实又生动，时刻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①

由此可见，“大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累积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大历史”主要关乎“识”。“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但就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治学者本人，都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上的平衡。梁启超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剖”和“鸟瞰”两种治史方法，来说明它们在具体研究中的互补性。前者“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后者“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空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因此，治学者“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②因此，我们都要把它们搜罗来，作为治史的技艺。

时间·空间·学科：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视域^{*}

王广义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新时代是党史和新中国史时代的一个新坐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注重回应时代需求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时间、空间、学科内容等视角下，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跨学科结合，从不同的时段、角度、层面来研究中共党史，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一、时间视域：长时段研究

历史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自有其内部的连续性，不能人为地割裂历史发展的源与流。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演进过程，短时段的研究很难总结整体性规律和展现大历史脉络。因此，我们要立足唯物史观，放眼宏观历史得出结论。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学

^① 黄仁宇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86—87 页。

^②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232 页。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北抗联国外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5ADJ005）

人开展了长时段、“大历史”式的党史研究，一改过去偏重短时段，单一、割裂的研究，提倡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起来，从而进入“总体史”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时段中的中共党史，上承中国古代史，下启中国当代史，更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研究，也更需长时段之研究，这样有利于“通古今之变”“鉴往而知来”，窥历史之真谛，有利于规律性、连续性与继承性探究。

纵向来看，中共党史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进程。在这三个历史进程里又经过若干个历史阶段，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等。这些不同的历史周期、历史节点、历史事件过程都可以说是可大可小的“时段”。短时段的事件，中时段的情势，长时段的社会结构一定要相结合。“对短时段事件的研究必然要求对中时段作情势的探析；而对情势的了解又必然要求对长时段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性质的总体把握”。^①如我们研读“四史”，应坚持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把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把70多年的新中国史置于近百年党的奋斗史中学习，把百年党史置于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和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上溯中华民族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才能充分激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视野。

立足长时段研究中共党史，深入探讨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要具有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广阔视野，为其提供高站位。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经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本土化发展的历程，是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党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一节，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②

从时序来讲，不仅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要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即“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分析”。“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并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溯历史，回落当下，服务现实、展望未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历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解决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必然要求中共党史的研究更为直接、更为深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更要加强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既要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更要关注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展着的问题。现实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历史中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积极解决现实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使党史研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③

从时间视域研究党史更需要有系统意识，要置身于一个纵深的历史时段，要历史地、全面地、

① 高尚、王四达 《从“总体史”到三时段——一个解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③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辩证地看党的历史问题,防止单一、片面、割裂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借助系统史学,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可以深入解析重要事件、客观情势和社会结构的特殊作用,由此推进党史研究的立体解读。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愈加深入,经验积累愈加丰富,党史长时段研究所面临的资政育人的使命也越来越艰巨,同时党史研究也将更加大有作为。

二、空间视域:全景式研究

在空间方面,党史研究要注重上下结合。学界首先冲决了中国传统的呆板、单一、直线式的研究框架,党史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来看,开始注重基层民众的主体作用,打破了只关注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传统研究,开始关注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多“向下取向”。普通民众生活史研究异军突起,以民众、民生、民本为关注点,揭示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从宏观着眼,由微观入手,宏观整体和微观个案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党史和全国党史的研究,而是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其反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底层看历史”,从中找出更加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规律来。“眼光向上”,关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眼光向下”,重新审视历史,展现出基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重组及其日常心态和生活,把社会下层群众的活动同上层人物的活动连接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同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从整体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为了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当今更多学者提倡“总体史”(或整体史)研究范式,但在实际研究中也未忽略精微式的历史研究,这种微观、个案的研究往往被置放于“大历史”的环境里,以此丰富、深化和加强宏观研究和综合研究。其研究特色在于宏观导向,微观切入,既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更充分注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应当说这是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在空间方面,党史研究还需要内外结合。既要从国外的角度出发看中国,也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国外(或称为“对称性观点”);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结合。

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前所未有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尤为不能置身于外。再者,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是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开放、丰富的历史,这必然对新时代党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以世界舞台的眼光、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来看待党史工作,引领时代潮流,推动国家发展。全球史的兴起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新视角,而且还提供了中外互鉴的新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共党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

“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②我们要打破就中国论中国、就党史论党史的模式,在注意党的自身变化的同时,还要注意“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跨越党际或国界,达到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中国需要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审视世界、理解世界,也需要从全球史中汲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② 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33页。

取全球性事务处理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史视角下,世界历史中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教训”,全球史进程的总体叙事以长时段角度展示历史的“规律”。^①因此,我们研究中共党史要将其置放于“全球史”“跨国史”“世界史”的视域下。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不仅要放到中国20世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而且还要放到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社会革命、国家构建的大环境下去理解,因为中国革命深受法国、俄国等国影响,属于“外发次生型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的探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中国革命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要在全球史视野下研究改革开放史,这样不仅要求讲清楚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要求讲清楚历史中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改革开放。^②既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又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这样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才能看出相互关联与异同。以“世界革命”为诉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的眼光。^③中共党史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建设的新路径,其关键就在于从全球史的研究视域出发,采用总体性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影响,从而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发展的整体推动,从而将中共党史研究融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总之,传统党史研究,大多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研究党史,而“世界—中央—地方—民众”之范式纵深拓展,互动融合,尝试构建更大的历史图景。统一性与多样性将是长期并存的,更需要以开放、互动的视角看待世界各地不同的史学传统,并多面向地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应当避免“去中国化”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基点从中国本土出发,立足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共产党自身。自中国看世界,自世界看中国,核心在于整体观。既不被烦琐的表象所迷惑,又要避免历史研究的单一化、片面化、主观化。中国学者应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积极推进具有全球史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党史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党史工作者当前紧迫的任务。

三、学科视域: 跨学科研究

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史学的常新,源自其多面性。法国年鉴史学派主张历史的总体观和综合观,认为历史是同人类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人的科学”。换言之,社会历史是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思想、宗教和人类生活各个要素的总体史。历史研究既要历史的各个层面进行研究,也要注意历史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之间有机联系的综合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党史研究不是对政治军事的单一研究,也不是对上层人物的简单论道,而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个领域历史活动的综合考察,具有内涵丰富、外延广博、涉及学科知识面广等鲜明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传统中共党史表述方式的革命性思维,研究内容的单一政治性内容,即着重突出阶级、党派、革命史本身,而忽视其他面向,有固化和封闭的趋势,遮蔽了党的历史研究中文化、社会、民族、科技等丰富多彩的多面向内容,弱化了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党史中的历史事件是社会前进历程中多种元素的有机整合,利用多学科多面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的深度、范围,使研究视野不断更新,更加系统全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科涉足中共党史,不少学者专门论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动向。但是,这些文章多从“新政治史”

^① Nicola Spakowski “National Aspirations on a Global Stage: Concepts of World/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3 (November 2009), p. 476.

^② 欧阳军喜 《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王奇生、黄道炫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红广角》,2016年第7期。

“新革命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角度加以切入。虽然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史内容多层面的延展，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在全面开展中共党史自身学科多面向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党史更加学理化。不要局限于传统史学方法，要进行多维思考，借鉴吸收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生态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领导科学研究方法等等。吸收、运用其研究理论、学术范式，不断更新研究视角，催生新的研究点，实现学科研究的重构与创新。例如在党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社会群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尤为重要，如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等等，运用心理分析，一定程度上使论证更加深刻，更有力地论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年代的群众基础。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①中共党史研究需要突破自身壁垒，融合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无论是开展中共党史自身多学科多面向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我们必须抓住“党史姓党”这一“本位观”与“主位观”，即党史研究必须坚持政治性，秉承研究的科学性，坚持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积极开展党史跨学科研究，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论断、大众言论的有机统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坚持全面研究、总体观察，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构建符合党史特征的学术话语体系。

总之，我们研究党史要有大历史观，不仅是指时间视域的长时段、空间层面的宽视野，还要有学科视域下的多层面，将党史研究构成一个“点”“线”“面”“体”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才能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立足新时代研究中共党史，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高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立足新科技革命的技术高度，紧扣时代主旋律，承继前人党史学者治史经验，拓展研究视域，创新研究方法，坚持历史的厚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做出科学阐释，进行“经纬化”研究，还原历史真相，总结历史规律、显现历史智慧，才能让中共党史研究之树长青！

责任编辑：吴 彤

^①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